



批·评·潮·系·列

刘 纳 著

嬗变

——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批评潮系列

刘纳此书立志打破相沿成习的旧畛域，有意将近、现代沟通贯串起来，具有十分明显的开拓性，是一本难得的填补空白之作。这本书的出版，将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袁良骏

本书不仅具有填补空白、开拓研究领域的意义，即使对于研究得较多的“五四”时期文学，也因此能有新的发现与新的认识。

——樊 骏

ISBN 7-5004-2296-2 / I · 319 定价：23.00元

批评潮系列

刘 纳 著

嬗变

——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刘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9

ISBN 7-5004-2296-2

I. 嬗… II. 刘… III. 文学史-中国-现代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4109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育才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875 插页: 2

字数: 358 千字 印数: 1 3000 册

定价: 23.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历史变动中的文学变革	(1)
一、文学界标与历史界标的重合和错位.....	(1)
二、文学神话：追寻“根本”的思路	(15)
三、面对世界：翻译与仿效	(26)
四、规律和选择：文学的历史性与非历史性	(41)
第二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文学	(57)
一、在“小说界革命”的旗帜下	(57)
二、时代歌手和光宣诗人	(65)
三、戏曲与弹词	(73)
四、男性导引下的女性写作	(84)
第三章 1912—1919 年的中国文学	(110)
一、凭吊：时代气氛与文学氛围.....	(110)
二、骂世、警世、混世、避世与售世.....	(142)
三、一个奇景：骈文的兴盛.....	(190)
四、中国古典文学的回光返照.....	(205)
五、终结与开端：回首新旧、文白之争.....	(229)
第四章 在比较中寻找变革的轨迹	(247)
一、从皈依政治到注重思想.....	(247)

二、“国民”与“人”	(265)
三、中年哀乐与青春感悟	(279)
四、酩酊与梦幻	(309)
五、望夜空	(336)
六、五四新文学创作者对于发难者的偏离与超越	(364)
第五章 五四新文学的实绩与光影	(389)
一、文体新格局中的散文以及小说与诗	(389)
二、探寻“巨人”	(402)
三、贫瘠的实绩与神奇的光影	(413)
本书所涉及的主要作家	(427)
主要参考书目	(435)
后记	(440)

第 一 章

历史变动中的文学变革

一、文学界标与历史界标的重合和错位

我国文学从“古代”到“近代”的变革，开始于 1902、1903 年间，完成于五四之后。它跨越三个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时期以及在这之间的一个没有名目的时期：1912—1919 年，经历近 20 年，由两代文学作者完成。

“近代”，不但是个表明时代范畴的概念，而且是个能够说明文学性质的概念。

从古代文学到近代文学的变革，首先发生在西方各国。它发生在“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意大利，出现了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但丁和人文主义先驱彼特拉克、薄迦丘。接着，发生在法国、在西班牙、在英国、在德国、在俄国……内容方面，表现为反封建、反专制、反神权，要求民主和人性解放。形式方面，表现为形成新的文学体裁、表现手法和使用比较接近口语的、本民族的文学语言。这个变革的过程与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发展的历史相一致，它反映出人类精神生活发展的共同趋势。

同样性质的文学变革也终于在中国发生，尽管中国文学的变革独具特色。

寻找这个变革的轨迹，便为文学历史的分期找到了依据。

1840年，确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年代。这一年，发生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国历史的转折，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社会形态转变。列强一次次入侵，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签订了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时期社会的变化是剧烈的。1840年前后的文学也出现了变化。在开拓型文学人物龚自珍的诗文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渴望变革、急欲突破传统的强烈要求。冯桂芬、王韬的作品开我国近代新体政论散文之先河。魏源、林则徐、张际亮、张维屏等人的诗文也都显示了一些变化。这些渐进性的变化表现了古代文学向“近代”发展的一种意向。

其实，“近代”文学的因素在1840年之前也已经开始萌生。我们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那是中国封建社会盛极而衰、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的年代，《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显示了尚朦胧、尚迷惘的近代意识的端倪。我们还可以追溯到明朝嘉庆至万历年间，当古老帝国内部终于艰难地滋生出新的经济方式的萌芽，在文化领域，有我国古代最具叛逆性的“异端”思想家、文学家李贽的出现，有反复古、反道学的公安派、竟陵派的出现，有洋溢着反抗精神的《四声猿》和透露出个性解放气息的《牡丹亭》的出现……文学变革的新因素早就在逐渐地积蓄着、准备着。

而在上一世纪末，中国维新人士中出现过一股否定文学的思潮。

前人对于上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历程进行过种种描述。如钱智修说，上世纪70、80年代有“富国强兵之说”，80、90年代有“格致实学之说”，1898年以来，“有民权自由之说，有立宪共和之说”^①；林语堂在1925年说过：“20年前始承认政体有欧化之必要，10年前始承认文学思想有欧化的必要”（《致钱玄同》）。他们的描述并不一致，也并不完全准确，

^① 《功利主义与学术》。

但却一致认为上个世纪的 80、90 年代正是我国输入欧洲自然科学，“格致实学之说”大兴的年代。

当时，我国的先进人士以为西方列强国富兵强的奥秘，在于重视声光电化之类的“实学”，而这种“实学”又是与文学对立的，不能并存的。王韬漫游欧洲，以见闻实感说英国之所以富强，在于他们重视天文、地理和声光电化一类的“实说”，而“弗尚诗赋词章”。^①留学过英国的严复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它们“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中国之所以贫弱是因为“其学最尚词章”，词章虽然极尽海市蜃楼，恍惚迷离之能事，却无济于救国。所以，散文不管是唐宋八大家，还是桐城派；诗，不管是唐诗派，还是宗诗派、通通是无用之物。因此，要想弃贫弱而谋富强，就必须弃诗词之类的文字而发展声光电化之类的“实学”。^②

上个世纪 90 年代维新运动已经兴起，开通民智的主张也已出现，但是，维新人士不但没有想到利用文学，反而把文学当成了自身经世致用的累赘。谁能想到，出身于书香官宦之家，又擅长诗词文章的谭嗣同，竟然说“文无所用”（《三十自纪》），诗歌是“无用之呻吟”（《莽莽斋诗补遗》），看戏竟会与赌博一样徒害而无益。谁又能想到，文坛骄子梁启超竟然会说，谁要想以诗词鸣于世，谁就是“浮浪之子”；^③谁要是耽于吟咏、笃好词章，谁就是“玩物丧志”。词章为害之大，“竟与声色之累无异”（《林旭传》）。谁又能想到当年的维新知识界中竟然以诗词为戒，相率而戒诗？

对于这种风靡一时的社会思潮，梁启超曾经从人们对于西学的认识的角度作过描述：“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

① 王韬：《漫游随录》。

② 严复：《原强》、《救亡决论》。

③ 《变法通议·论文学》。

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以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书中求之，亦确无其他学问可见。”^① 王韬则主要从新学发展状况的角度说明当时的人们凡谈论富国强兵，无不以发展实业为上策，“一若裕民而足国，非此不可。至于学问一端，亦以西人为尚。化学、光学、重学、医学、植物之学，皆有专门名家，辨析毫芒，几若非此不足以言学，而凡一切文学词章无不恶废”。^② 查一查当年的学会名目和西学书目，可以验证他们的描述是可信的。

在传统的文化结构中，虽然小说戏曲受到轻视，但诗词文赋还是够资格与经、史、子并列，成为“四部”之一的。传统的文学观念中，既有人把诗视作足以感天地、泣鬼神的神物，也曾有人看成雕虫小技，但绝没有人将其当作“与声色之累无异”的“丧志玩物”。

上述否定文学的思潮以其尖刻和偏激显示了当年知识界对于传统文学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感既然来自先进人士对于旧文学的激愤，岂不也包含着他们对于未来文学的厚望吗？人们既然依据对于西学的认识否定了以往文学的社会价值，岂不会根据对于西学的再认识，重新肯定文学的社会价值吗？日后文学变革运动的兴起表明，这是一个新的历程的开端，人们将要重新确定文学的外部关系与内部关系，重新探索文学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

戊戌变法失败后，1899年12月，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里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和“文界革命”的预测。这是我国近代文学变革的重要文献，它准确地表述了文学变革的两种思想倾向：批判传统文学和借鉴欧美文学。它指出我国千余年以来的诗人如同“鸚鵡名士”，陈陈相因，诗歌境界已经被开拓殆尽，已经到了“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的危急关头；必须输

① 《清代学术概论》。

② 《上当路论时务书》。

入欧洲的“真思想”、“真精神”、“真意境”，必须出现哥伦布式的人物开辟诗歌新大陆，必须有高唱《马赛曲》的勇士破旧以求新。它认为当时“诗界革命”已经显示出即将到来的征兆，却还未到来，诗歌界的哥伦布将要出世而尚未出世，不像后来的《饮冰室诗话》那样轻易称许诗人。它虽然规定了“旧形式、新内容”的“革命”方案，但又意识到新内容、新语句和旧形式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不像《饮冰室诗话》那样以新内容与旧形式的结合作为诗歌“革命”的极致。在此之前，1898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写道：“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表现了对小说政治作用的期望。

“新”的、“近代”性质的因素终于发展成为我国文学的主潮，从而改变了我国文学的性质，是在1902、1903年间。

梁启超说：“19世纪与20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①我国文学的“新陈嬗代”也酝酿于此时。到1902、1903年间，终于在文学观念、文学的精神意向等方面，都显示出了大变的趋向。

出现在1902—1903年间的大量文学现象表明：正是从这时起，我国文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发表《饮冰室诗话》，开辟《诗界潮音集》专栏。《新民丛报》第3号发表了蒋智由的著名诗篇《卢骚》：“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诗的最后两句次年被邹容在《革命军》中引用，成为嘹亮

^① 《本馆第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载《清议报》第100期。

的时代号角。

1902年，梁启超发表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他大大发展了《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抬高小说作用的论述，不但奠定了“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基础，而且对我国文学观念的变革有重要影响。

也是在1902年，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创刊。这是我国第一种近代性质的文学杂志。在这一年，它发表了雨尘子的《洪水祸》、梁启超本人的《新中国未来记》、署名“羽衣女士”的《东欧女豪杰》等作用，这些作品表现了新的社会理想和精神意向。同时，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这一年中共刊登6篇小说，其中5篇取材于西方国家人物故事。

也是在1902年，李伯元发表《庚子国变弹词》，它“是代表了旧的弹词最高的发展，是突破了英雄美人、佳人才子一般固定的老套，走向广大的社会生活，历史上的特殊事变。根据这已有的最高的发展，是更易于探寻再进一步的新路的。”^①

也是在1902年，于右任写下了洋溢着新的时代精神的诗歌。如《杂感》：“……地球战场耳，物竞微乎微。嗟嗟老祖国，孤军入重围。谁作祈战死，冲开血路飞。”如《从军乐》：“中华之魂死不死，中华之危竟至此？……吾人自当造前程，……风潮汹恶廿世纪。大呼四万万六千万同胞，伐鼓拊金齐奋起。”如《和朱佛光先生步施州狂客原韵》：“愿力推开老亚洲，梦中歌哭未曾休。人权公对文明敌，……革命才能不自囚！”

1903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文明小史》等谴责小说开始在《新小说》、《绣像小说》等杂志上连载。这些作品对社会现实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前所未有的揭露。作者们呼吁改革弊俗，刷新政治，富强国家，开通

① 阿英：《重刊〈庚子国变弹词〉叙》，《小说二谈》第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民智。谴责小说的鲜明的“暴露”的倾向，显示着我国小说主题走向的改变。

也是在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问世。它“破嗓裂喉”，“劝动天下造反”。它实现了宣传性与文学性的融合，建立起了新的宣传性散文的典范。

也是在1903年，秋瑾写下著名的《剑歌》、《宝剑歌》。在这一年，16岁的柳亚子开始发表诗作。在这一年，高旭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欲为我国民牺牲者其歌者》、《海上大风潮起放歌》、《军国民歌》等。在这一年，《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国民日报》等进步刊物刊行，它们发表的大量诗文、小说、戏曲，显示了新的文学姿态。

应该承认，直至五四以前，我国文学的传统格局仍然维持着，但是，自1902、1903年之后，在表层之下，已经汹涌着新的文学洪流。作者们虽然容忍了传统的封闭的总体模式，却给已趋僵化的艺术定型注入了新的生气。他们大大抬高了小说、戏曲的地位，他们把民间通俗形式弹词、戏文、歌谣等引入了文学的厅堂。这些，为五四时期我国传统文学格局的大突破开拓了道路。

开始于1902—1903年间的文学变动与当时社会政治思潮的变化是一致的。

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中，1903年已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李泽厚曾认为1903年的拒俄义勇军运动是一个“历史界标”，这一年“成为革命发展行程一个关键的转折年头”。他指出：“全国各报刊由温和而激烈，由改良而革命，是在这一年。邹容、章太炎的著名革命文章和轰动一时的《苏报案》，是在这一年。陈天华那影响极大的小册子的产生，是在这一年。鲁迅译作《斯巴达之魂》，提倡‘尚武精神’和爱国主义，是在这一年。”^①章开沅也

^①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29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认为“癸卯年是中国进步思想界空前活跃起来的一年”，他指出：“经过‘拒法’、‘拒俄’和《苏报》案三次斗争，人们迅速增强了政治觉醒，……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精神堤防日益溃决，民权革命的思想仿佛清新的春风一样吹拂着祖国的大地。”^①

在这里，文学变革的界标与历史的界标相重合了。在本世纪的前20多年，甚至在整个20世纪，它们大致是重合的，于是历史分期成为了文学分期的依据。以历史分期为依据并非无视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化，而是出于对这样的文学历史发展事实的尊重：我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变革，始终与政治历史、社会思潮的变化，与中国知识分子寻找救国道路的历程相一致。

我也曾经希望回到文学自身，去寻找我国文学从“古代”到“近代”性质的变革的“内部”规律，得到的却是困惑。从内容方面看，我国文学自明朝中叶就逐渐蕴积着个性解放的因素，然而，开始于1902—1903年间的文学变动却与此种精神意向是脱节的。被政治需要挤压着，个性解放的因素没有继续发展，大量表现在进步文学中的，是另一侧面的近代意识——群体意识。从形式方面看，王国维说：“盖文体通行既久，指染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中衰者，皆由于此。”^②在产生了《长生殿》和《桃花扇》、《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样优秀的伟大的作品之后，古典戏曲、古典小说明显地呈现出衰落趋势。古典诗词、古典散文衰落趋势出现得更早。我国古典文学的各种形式，早就盛极而下，需要寻求“解脱”之路。但是，一个多世纪的文学实践证明：尽管不乏“豪杰之士”，单靠文学自身的力量，是无力促成各种文体的“解脱”的，更无从实现真正的变革。

① 《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跋乌目山僧癸卯诗三首—1903年的国内革命思潮》。

② 《人间词话》第54则。

与古今中外一切精神领域的变革一样，我国文学变革“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① 陈独秀说过：“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② 然而，这种概括只是在间隔很远、隐藏很深的“根本”的意义上才是无懈可击的。人们可以列举数字，说明进入 20 世纪之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在五四之前，又有了更大的发展。例如，“拿全国各地逐年创设的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来说，中日甲午战争后 6 年间（1895—1900 年）共有 104 家，资本总额 2300 多万元，每年平均投资 380 万元多一点。这以后，从 1901 年到辛亥革命前一年的 1910 年 10 年间，共有 370 家，资本总额 8620 万元，每年平均 862 万元。”^③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资的面粉厂由 20 多家增至 100 多家，纺织厂由 10 多家增至 50 多家，纺锭数由 40 多万增至 150 多万……这些是事实，不过，又是多么不足道的事实。华资工商业的有所发展，远远不足以改变民族资本主义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微弱比重。以经济原因、阶级原因来直接解释我国文学变革，只能得出牵强的结论。

是的，“应当记住，决不是‘上层建筑’的一切部分都是直接从经济基础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同经济基础只是间接地发生关系的。因此，在讨论艺术时必须考虑到中间的环境。”^④ 在探讨我国文学的变革的时候，首先“必须考虑到”的“中间的环境”便是先进知识分子寻找救国道路的艰难历程，以及他们发动的思想启蒙运动。

1917 年，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难宣言《文学革命论》里，将“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的“大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本第 3 卷，第 56 页。

② 《科学与人生观·序》附注《答适之》。

③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第 843—844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④ 普列汉诺夫：《论〈经济因素〉》。

分”原因归结于没有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配合。70多年来，这一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概括不但被人们接受着，而且，被发展了，学术界形成了相当普遍的看法：缺少一个近代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启蒙运动，才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因而才有五四新文化活动的“补课”。事实上，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同时，曾经对封建主义思想堡垒发动猛烈的攻击，曾经广泛地传播了近代民主思想，曾经发动过具有相当声势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个思想启蒙运动不但有“政治思想”的启蒙，也包括着提倡“道德革命”、“家庭革命”、“三纲革命”、“女权革命”等内容。不但梁启超在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期间，热情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文化学说，“倡民权”、“倡自由”，以不可抵挡的煽动力量呼唤“大变革”、“大破坏”，不但卓越的革命宣传家邹容、秋瑾等慷慨悲歌，为民主、为社会进步奔走呼号，而且，在《湖北学生界》、《直说》、《广益丛报》、《国民日报》、《觉民》、《安徽俗话报》等刊物上，都激荡着反孔、反封建、反专制，铸造新国魂的呼声。当时先进知识分子集中的中国留日学界，“人人皆心醉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学说，各以卢骚、福禄特尔、华盛顿、丹顿、罗伯斯比诸伟人相期许。”^①即使排山倒海一般的“排满”宣传，也不能遮掩这个思想启蒙运动的民主主义光辉。而且，对“排满”也要做具体分析。在当时，“推倒满清政府”本身，就包括两重意义：“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②陈天华在《绝命书》中也写道：“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鄙人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复仇论者所云，仍

①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46页，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0年版。

② 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

为政治问题也。”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进展，例如有的学者在列举了本世纪初几年间革命派报刊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大量材料之后，写道：“把这些文字同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新青年》比较一下，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是何等相似！我们甚至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初期新文化运动的那些基本特征，……早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最初阶段就已粗见端倪了。”^① 历史学家蔡尚思指出：“辛亥革命时期，在政治上是以进行民主革命为中心，在思想上是以反孔教反封建传统思想为中心。就这个反孔反封建传统思想而论，是超过了戊戌变法时期，而为五四运动时期的前驱的。”^② 开始于 1902—1903 年间的文学变动，正是与此同时开始的声势壮阔的思想启蒙运动之重要一翼。

中国近代性质的文学变革发生在先进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地寻找民族出路的历史行程中。它因“救国”的需要而发生，为表现时代主题而存在。从这里入手，我们便能梳理出、把握住本世纪前 20 多年间文学行进的主流趋向。

辛亥革命时期与五四时期，这是两个历史的时期，也成为了两个文学的时期。作为历史时期，它们分别以 1911 年 10 月 10 日的武昌起义与 1919 年 5 月 4 日的爱国反帝运动为中心。在本书中，辛亥革命时期的时间界限是自 1902—1903 年间至 1912 年初，历史界标与文学界标基本重合。而对于作为文学时期的五四，则需要作如下说明：

1917 年初，当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张扬起“文学

① 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与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收入《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一书，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思想运动》，收入《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